

# 南北紀事

程 序 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

---

## 南北纪事

---

作 者/程 序

责任编辑/谭德山

封面设计/谭德山

版式设计/寇 炫

---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精卫彩色印刷厂

---

850×1168 32开 6.75印张 148千字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

ISBN 7-5073-0279-2/k·83 定价: 15.00元

---



作者近影



1991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同作者亲切握手。

1988年  
秋天，陪同  
彭真委员长  
视察厦门特  
区。



1995年  
5月，与胡  
锦涛同志亲  
切交谈。



与中共  
福建省委领  
导同志一起  
参观邓小平  
图片展。



1992 年，  
访问印度尼西亚时，与印尼  
著名企业家林  
绍良先生（右  
一）在一起。



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



解放战争时期，与夫人王贵轩在沈阳。



# 目 录

|                 |       |
|-----------------|-------|
| 踏上革命征途.....     | (1)   |
| 在闽江抗日烽火中 .....  | (21)  |
|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  | (37)  |
| 挺进东北建政浑河畔 ..... | (63)  |
| 转战辽东的日日夜夜 ..... | (93)  |
| 接管沈阳建设沈阳.....   | (125) |
| 身经动乱信念弥坚.....   | (141) |
| 心血再献八闽大地.....   | (149) |
| 志在大业千秋.....     | (169) |
| 附录：诗词选.....     | (177) |
| 后记.....         | (209) |

# 踏上革命征途

(1919年5月——1935年6月)



1919年5月12日，我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县海口镇的斗垣村。这是一个濒临福清湾，靠山临海的小村庄，全村不过500多人。村前是一片浅滩，堤外就是海，每当海水涨潮，浪打堤岸发出的响声，像呻吟，像呐喊，像怒吼，我的童年就是在聆听这悲愤的海涛声中长大的。我祖父陈国祥是一个乡间郎中，每日早出晚归。听我母亲说过，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陈宏宇还在福州念书，他是毕业于政法学院的学士，亲身经历了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五四”运动。

1918年海口镇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海啸，堤溃坝崩，几十人死于这场灾难。地方官府置民难于不顾，仍行苛政，从学校毕业返乡的父亲协同乡人积极筹资筑坝修堤，整改河道。后来，父亲积极参加反“百税捐”斗争和投身于反对日货运动，在海口这个海湾小镇，检查和烧毁日货。1930年海口镇的奸商勾结盐缉队撕毁反日标语，父亲等人前往评理，早有预谋的盐缉队关闭大门抓人，父亲等人，坚决反抗，但寡不敌众，惨遭吊打。从此，我家成了反动当局的眼中钉。当年除夕，正当家家户户要吃团圆饭之际，父亲的朋友派人匆匆赶来报信说，有人密报我们陈家是“共匪”，反动当局要来抓人，让我们先躲一躲。于是，全家丢下刚拿起的筷子躲入深山。祖父母和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妹妹、两个弟弟在寒夜里度过岁末，在黑暗中迎来新年。

父亲是三个被吊打者中受伤最重的一人，全身都是被枪托戳打凝成的血块，胸部成片成片的黑紫色，常常吐血。不久，父亲带着病体离开故土，南渡印尼，不到一年他又借了别人的50元大洋回来了。

1931年12月，我在融美中学读书时就参与组织学校抗日演出队。有一次，我们正在校门口的广场上演出自编的话剧，一

群林靖匪兵冲进会场，试图阻止我们的抗日宣传，激起了群众的反抗，于是，拉开了龙田、高山、海口一带的农民暴动的序幕，也就是史料中记载的“龙高暴动”。那时，我才13岁，凭着一股对反动派的仇恨和几位同学参加了这次暴动。我和同学们一道举火投向匪兵，俞昌辉同学在战斗中中弹负伤。平时被兵匪迫害最深的三山乡嘉儒村青年农民俞泽南仔，肩顶煤油箱，沿着20余级的竹梯从文昌阁的后墙向屋顶攀登。阁后有两个楼窗，匪兵们一面向窗外投手榴弹，一面向屋顶和窗口猛烈射击。俞泽南仔冒着密集的弹雨登上屋顶，掀开瓦片，点燃蘸饱煤油的棉团投入阁内，顿时烈焰四起，那些作恶多端的匪兵在熊熊大火中鬼哭狼嚎。起义农民攻下文昌阁，俞泽南仔却献出他年轻的生命。

龙高暴动中，我认识了陈行福、陈金来等人，他们后来成为福清革命的组织和领导人。这场暴动在福清来说是史无前例的，震惊了当时的福清反动势力，震撼了八闽大地。

当时“九·一八”事变刚过不久，由于南京政府在日本的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号召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抗日的烽火在中华大地燃起。龙高暴动虽属于群众的自发斗争，但已有少数党、团员和党的外围人物参加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场暴动在当时来说是成功的，迫使当时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做出让步。在暴动中，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战斗洗礼，也就结束了我的少年时代。

对少年时代的记忆中，有三个人是永不忘怀的：一个是林绍良，他家就在我们斗垣村的后面，隔着一座小小的山包。他

常常来斗垣讨小海，我们成为童年时代的朋友。后来我参加革命，绍良迫于生计远渡南洋，直至 1984 年才重逢于香港。第二位是我的二舅父夏昌福。他是个受“五四”运动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毕业于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阳下小学任教。二舅父是我反封建的启蒙老师，我能成为无神论者与他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一位是我在阳下小学时的校友余长钺，他就是阳下村人，父亲出国经商，他留在家乡就读。我们志同道合，他和我在村里曾掀起一场风波。那时我们学校设在宗族的祠堂里，这祠堂原是所谓“郑氏仙庙”。传说为“郑一”“郑二”“郑三”仙人所居，祠堂里还分别塑有这“三仙”的泥像。我和余长钺等几位同学商量后就“摘了”“三仙”的“脑袋”，还把这三个“脑袋”扔进茅坑。村里的那些封建先生说我们坏了纲伦，恰巧村里一妇人精神失常，他们就借题发挥大作文章，妖言惑众，将此“罪”归于我二舅父，迫使学校解聘我二舅父。我和余长钺也因此离开阳下小学。后来，我们俩经常往来，他常给我传递《新青年》杂志、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诗集《凤凰涅槃》等书籍。余长钺投身革命较早，我与革命组织的直接接触就是由他引荐的，不幸的是他后来被叛徒出卖，牺牲于福州鸡角弄。

理想是人生的灯塔。革命者的理想和事业建立在驱赶黑暗迎接光明的信念上，为了理想和革命事业献出青春甚至生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感。余长钺离开人世时不满 19 岁，正是美好的青春年华，然而他却将这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壮丽的革命事业。

我记得，在阳下小学时，我和余长钺常常谈心于月光下的小溪，“郑三仙”的庙门口，还有那洒满秋色的田野里。

龙高暴动之后，中共福州市委就派了宣传部长黄孝敏来福

清了解情况和组织农民运动。那是 1931 年的冬天，余长钺带来了这位陌生人，余长钺对我说了他来的目的，要我严守机密，并说黄孝敏身患疟疾需要治疗，希望我能给予帮助。我的父亲、母亲虽说不完全知道这些底细，但也能看出个眉目，我的祖父就成了黄孝敏的医生。从那以后，我家小阁楼就成了党的秘密活动点。这位原籍古田的黄孝敏，长相和蔼可亲，他待我如兄长，对我十分信任，他在斗垣住下之后，我就陪同他了解农村的情况。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当时我写了篇《蒋日妥协感言》，还写了《致张汉卿将军的一封公开信》，我满怀爱国激情地在信中写道：

“汉卿将军麾下：

报载沈阳沦陷，日寇长驱直入。一道‘不抵抗’命令，陷东北三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余乃区区东南一少年，虽不敏，但幼读史书，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大义，闻讯五内俱焚，夜不能寐，愤笔疾书，国人共鉴。

将军乃东北地区封疆大吏，生于斯，长于斯，乡亲父老在于斯，拥兵数十万，守土有责。英年令誉，奈何以“不抵抗”恶名蒙羞国人？！

皇姑屯事件父仇未雪，十二道金牌岳武穆饮恨千古！史为今鉴，伏望将军三思，请以岳武穆《满江红》壮志为怀，挥戈东指，收复国土。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区区不才，愿请缨杀敌，效命疆场。

谨待教言。

程序

1931 年 9 月 30 日深夜

于融美中学”

这两篇文章还被当做学生的范文张贴出来。黄孝敏借机给我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指明了我未来的奋斗目标。他要求我们很好地总结龙高暴动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林靖被打倒了，但国民党福建省长方声涛又派新军阀刘骏部来接防，敌人的力量暂时还是强大的，我们要转入隐蔽斗争，并指示陈行福（暴动的参加者）继续组织、保存一部分武装力量，在福清南区一带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发动农民起来对地主阶级进行政治上、经济上的斗争。指示我和余长钺分别在福清的东、北区开办民众夜校，组织秘密农会，开展抗租抗税斗争。

黄孝敏的话我很快就理解并接受了，我就在斗垣村组织了秘密农会，先是办民众夜校，再从中组织农会，我向他们宣讲革命道理，让他们明白穷人为什么穷，穷人要改变命运只有靠自己斗争。第一批农会会员有陈忠雄、陈吓当、陈如山、陈三歌等12人，后来农会扩大了范围，还有另外几个村的人参加，如林清城、陈玛瑙、张科题等人。余长钺在北区也成立了农会。当时我为了便于宣传，编了一首民歌，题为《抗租抗税歌》：

天苍苍，地茫茫，终日辛苦为谁忙？

穿无衣，吃无粮，病无医，睡无床。

保长抓丁又催税，财主逼债催租粮。

受苦的乡亲多凄凉：

姓“穷”的人多力量大，参加农民会，有事好商量。

抗捐、抗债、抗租税，不支差役不纳粮。

恶鬼逼得紧，索性反他娘！

黄孝敏的到来，在我母亲的心里也点燃了一盏明灯，使我母亲献身于革命事业。黄孝敏的吃、住、行全落在穷困中的母亲肩上，她凭着特有的机智和勇敢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掩护和

交通任务。

人生的路，也许就是在瞬间闪现出他的光辉，也许是在漫长的行程中积累了辉煌的功绩，也许是在平凡中展示其人生的真谛，我母亲就是最后一种人。我的母亲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家妇女，她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是令人敬佩的。在父亲伤病时，她艰难地担负起一家 13 口人的生活重担；母亲又是晓事理明大义的，对我投身于革命，她是全力支持的，可以说，没有母亲的正直和勇敢，没有母亲的自我牺牲精神，也不可能有我的今天。所以在这里我要对九泉下的母亲说一句：亲爱的妈妈，我爱您，这爱不只是母子之情，还溶入了一份革命的情意。

黄孝敏走后，农会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也很有成效，还受到上级的表扬，农会的这些会员后来都成为我党的基本力量和革命斗争的骨干分子，经历了各次风雨的考验和磨练。

福清党的地下斗争就和我母亲，我这个家，我们这个斗垣村的农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母亲一直到共和国成立都是担任党的交通工作，同时还把我家的兄弟姐妹都送到革命队伍中去，我的弟弟陈振先不幸牺牲于福清、长乐交界的蕉岭。现在那里还建立着烈士纪念亭。

我参加革命后，仍继续上学，一边学习，一边秘密地为党工作，当时我母亲供我上学是十分不容易的，她变卖了自己的嫁妆，我也不负重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融美中学，在学校又以出色的成绩受到老师的爱护和同学们的尊敬，这对于我这样的家庭是个莫大的宽慰，使我病中的父亲和挣扎在生活困境中的母亲也感到最大的幸福。我是在他们严慈的爱中长大的，他们质朴的爱国精神贯注在我的整个心灵和血液中，因此，我在青少年时代的诗中无一不流露出亡国之忧的情绪。如其中的

《九·一八有感》写道：

大耻凭谁雪？  
伤心举国同；  
国贼窃神器，  
山河易色颜。  
请缨缚苍龙，  
横眉剑出鞘；  
策马驱外寇，  
头颅一掷雄。

这是我在日本入侵我中华大地时发出的愤慨，那时我真想投笔从戎，为救国救民去尽我辈之责。我也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和热情吸引了许多进步的同学，大家在一起抒发爱国热情，切磋青年的职责，探讨无国便无家、爱国就是爱家、卫国就是卫家、救国也就是救家的道理。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组织起学生宣传队，经常下乡宣传抗日，以唤起更多的民众起来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当听到蒋介石的军队不抗日而退却，让大好河山任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他却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时，我奋笔疾书，写了《伪“三民”主义歌》，剖析并痛斥伪三民主义者是“既祸民国，复送辽东；嗟尔‘同志’，内战无穷；夙夜匪懈，金钱是从；崇洋媚外，压迫人民；争权夺利，无尽无休。”我激愤地喊道“群起而攻，祝尔速亡；呜呼哀哉，伏维尚向。”

1932年2月，淞沪之战震动了世界，显示出中华民族之威，同学们奔走相告，校园一片欢腾，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有感》就写于此时：

一战未成当再战，  
今生未遂有来生。

马革裹尸寻常事，

江山不复誓不还。

这些诗文均被老师张贴在校内的墙上，引起同学们的强烈反响。

我从一个爱国少年走上革命道路，黄孝敏算是第一个引路人，他把我从朦胧的革命意识引导到自觉的、强烈的、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光明大道上，使我开始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并把自己的目标溶于整个民族解放的事业，服从于、忠实于这一事业。

回想起黄孝敏，真叫人悲喜交加，我为我们的相识而欣喜，也为失去这位党的领导人而悲痛，那时，我和他一同下乡秘密调查，聆听他的启发，备感亲切，至今他的面容依稀可见，他的声音绕于心间而久久不能忘怀，他是和挚友余长钺一同壮烈牺牲于福州鸡角弄刑场，一同牺牲的还有王于洁、潘涛、陈炳奎。他们的遗体是我去收埋的。那天夜里，凄风苦雨，五位先烈的遗体血迹斑斑，地上的血滩像悲愤的河水永远流淌在我的心里。这没有使我畏惧，反而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和意志。在以后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我能置身于大革命的艰难险阻逆境中不屈不挠地走下去，就是以他们为人生的楷模。

黄孝敏来到我家，既影响了我，又影响了母亲、祖父、还影响到我外祖父，以及几个姨妈、姨丈；当然还有何文成、陈炳奎、陈金来等人，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一起为福清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何文成也是我人生路上不能忘怀的同志和挚友。我们相识在融美中学，相见的那天，他如老友相逢，很爽快地对我说，我早在贵校的墙报上认识你，拜读了你的《蒋日妥协感言》、《致



张汉卿将军的一封公开信》，我们的心早已相通，偏偏相识恨晚。何文成当时是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的，他常常来找我，我们先是从历史谈到现实，从国内谈到国际，我发现这位龙田镇芦江小学的教员思想十分敏锐，文径通达，诗趣高雅，才华横溢。有一次我在他的住处发现他的一篇文章，题名为《走快些，就是跑！》，写的是福州乌石山师范学生李光，参加示威游行被国民党警察抓走，在审讯时，敌人问他，你为什么散发传单？为什么跑？李光坦然答道：“传单不是我散发的，我也没有跑，只是走快些！”“走快些就是跑！”敌人蛮横地嚎叫着，后来李光被杀害了。何文成这篇文章就是以李光的形象歌颂革命者的坚强，鞭鞑敌人的虚伪和懦弱，同时揭示了光明与黑暗势力搏斗的悲壮美，深深地流露出何文成对李光烈士的敬爱之情。

这篇文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心灵里筑起信念的“堡垒”，树立起一个巨大的形象，这形象不只是李光，还有我那时所知的很多英烈和革命者。后来我才知道何文成是共产党员，1930年冬，在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读书时因参加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的集会游行和撰写革命诗文而被捕入狱，一年多后，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夏获释回到福清，建立了中共福清特别支部委员会。我和他接触时他就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秘密从事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的工作。1933年暑假前，他找我，希望我能为他在海口搞个点，来扩大他与外界的联系，更广泛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但又不能暴露身份。最后我们商量决定在海口这繁闹的小镇举办“国文补习班”。如何办，我想到父亲，我父亲因在海口工作过又有些声望和社会关系，希望通过他达到这一目的。此时父亲正病重在家，只好通过老朋友、老同学